

章开沅 马 敏 主编

华 大 学 人 研 究 书 系

韦卓民纪念文集  
Wei Zhuomin Jinian



Wenji

清华大学出版社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 韦卓民纪念文集

Wei Zhuomin Jijian

章开沅 马敏 主编



華中師大出版社

Wenji 文集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卓民纪念文集/章开沅，马敏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4244-4

I . ①韦… II . ①章… ②马… III . ①韦卓民 (1888—1976) —纪念文集 IV. ①K825.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200 号

## 韦卓民纪念文集

---

主编：章开沅 马 敏 ⑥

责任编辑：冯会平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87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25

版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9.00 元

---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总序**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真正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少数知名大学之一。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批又一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现今华师的奠基与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先驱者的丰功伟绩。

现今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从规模、设施、师资与教学科研水平哪一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自己历史上的那些前身。但这些前身毕竟为今天学校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一种无可取代的宝贵资产，其中包含的有些重要无形资产甚至远远高于其相关联的有形资产。由于这方面的感悟日深，许多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旧有的典籍、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迟至今日只能说是亡羊补牢。但更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要数延续学脉与传承精神。高校不是一般的教育机构，乃是学术文化延续的载体。学脉是学科孳生繁衍的谱系，精神是众多学科群共生互动焕发的校园神韵，而兼任两重载体且流光溢彩于百年岁月之间的则是那一代又一代的杰出学者。

王缁尘撰《汉学师承记评序》云：“《汉学师承记》者，清乾嘉时江氏藩之所著也。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物，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思想。以此学术思想，由此人物而流行支配于社会政治间，而此民族文化遂发生变动而或以之衍进焉。准是以言，则学术思想实民族文化最重要之因素。”宋元明清学案之作勃兴，佳构巨制比比皆是，而王氏高明之处则在于突出探究学术思想，而非停留于仅仅陈述“经师之事迹与授受之源流”。其评论最精彩之处是阐释各个时代学术思想之关联：“且此时代之学术思想，与前一时代、后一时代之学术思想，皆有密切之关联。或为反对前之学术思想而产生，而其时尚扬前时代之余波；或为启迪后之学术思想而僵死，而其时已露后一时代之萌蘖，此其不能划然分割者也。”王氏此处讲的虽是影响覆盖整个社会的宏大学派，但类似的现象在校园学科之间也不胜枚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对学者业绩及其思想，大体上都可以作如是观。

华师百年，才人辈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获得学界的高度评价。这其中与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恽代英，他36岁慷慨就义，留下遗著300万言，为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了几十部厚重著作；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他的著作不断再版，在学界影响甚大，许多已经成为研究历史、文学的学者的必读书；逻辑学家、哲学家詹剑峰先生，他在西方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研究尤其是墨子和老子研究方面浸淫很深。还有杨东莼、包鹭宾、韦卓民、黄溥等，这些都是华师历史上灿若群星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华师历史上也曾留下过足迹，如冯友兰、王亚南、吴宓、游国恩、傅懋勤等，他们也是我们这所老校的骄傲和财富。出版社已推出的“桂岳书系”（8种）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百年来优秀学人的探索轨迹和学术成就。

华师精神是“忠诚博雅，朴实刚毅”，在这精练的八个字的启发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倾力打造一个学术品牌，名为“华大博雅学术文库”。其中，国学出版将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推出了《张舜徽集》的一、二辑共10册（第三辑三种5册也即将付印），“道家道教研究书系”中也收录了詹剑峰先生研究老子的著作，《钱基博集》已经进入整理阶段，将成为我校出版社“十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另外，韦卓民先生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的译作也在分阶段推出。我们设想，以“立足教育，弘扬学术”为指引，出版社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坚持不断地提高学术品位，推出学术精品，而挖掘百年老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将是工作的重心之一。

在推出百年华师历史上学人的著作的同时，我们也想到，对这些学人进行研究，研究他们的生平、治学生涯、学术思想，无疑可以更进一步推动对他们学术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些青年学者做过一些工作，出版社就曾经出版过《张舜徽和清代学术史研究》，但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此次有机会推出《恽代英年谱》和《钱基博年谱》，出版社也设想借此机会推出一个新的书系，着眼于研究百年华师历史上成就卓越的学者和他们的学术，丛书名拟订为“华大学人研究书系”，一方面可以将以往已经出版过的相关图书进行整合，另一方面也主动策划一些选题（如年谱、评传、专题研究以及相关人物的研究资料汇编等）。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推出可以激发对前辈学人的深入研究，从而弘扬百年华大的学术传统，以期华大学脉世代绵延！

章开沅

2006年冬于桂子山之实斋

# 序

章开沅

两年多以前，我在辞去校长职务时，曾经说过：“未了之心愿与未竟之事太多太多。”举办韦卓民研讨会与出版韦卓民文集，就是这些众多的未了之心愿与未竟之事之一。现在，经过校内、所内同仁的努力，不仅成功地举办了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还能及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总算是帮助我了却了一桩期盼已久的心愿，这可能也是散布海内外各地的华大校友以及韦先生亲友的共同心愿。

我与韦卓民先生相识与共事近三十年，但遗憾的是相知却始终甚浅，这当然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过，我的内心深处，对他人格与学问的尊敬，并未因年龄与处境的悬隔而有所减损。20世纪50年代初，常听说他过去办学之艰难，他的一句口头禅——“为谁辛苦为谁忙”，至今仍使我感奋不已。1956年“向科学进军”之日，他带头与张舜徽先生就儒学问题争鸣，引经据典，纵横论析，其学者风范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因为不同科系，平时少有与他交谈的机会。直至

“文革”后期，我们都曾被作为“三等公民”编在“政史连”，才能有幸常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韦老诲人不倦，有问必答。记得有次我问及“异化”一词的来源及原始含义，他查了许多原著，并密密麻麻写了一大张纸为我解惑，其知识的渊博与治学的严谨确实使我心折。但可惜不久他即因病去世，死于即将可以发挥其更大作用之日，对于华中师范大学和学术界都是极其重大的损失，真是时也！命也！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在学校公务之暇开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特别是在1990年赴美集中力量从事此项研究以后，对韦卓民先生的思想与实践，才逐步获得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韦卓民一生最大的贡献，当然是参与创办与领导了华中大学。华中大学在13所教会大学中算不了顶尖角色，但它却办得相当有活力并有自己的特点。韦先生一直主张控制学校的规模，而把质量的提高放在第一位。华中大学虽然位于内地，但他通过哈佛—燕京学社和雅礼协会，把它与国内外的名校联结起来，在教学、科研、师资、图书、设备诸方面都受益匪浅。他对外勇于开拓，对内善于凝聚，正如一位老校友追记所说，他与孟良佐主教一起，“近乎奇迹似地将文华、雅礼、博文、博学和湖滨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华中大家庭”。其辐射力早已超越武汉与湖北，而扩大到整个华中乃至华中以外地区。抗战爆发后，他领导全校西迁，长途跋涉，颠沛流离，经桂林、昆明而复课于大理附近的小镇喜洲。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历尽艰辛，弦歌不绝，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老校长倾注全部精力于华中大学，因此，也就赢得海内外校友的倾慕爱戴。他逝世以后，各地校友追思不已，在台北繁华的敦化南路设有韦卓民纪念馆，在新埔工业专科学校还建有卓民楼（东海大学资助），最近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又树

立他的塑像。凡此种种，都说明他对高等教育的伟大奉献永远被铭记在后代的心中。

其次，韦卓民不仅是一位干练的校长，而且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中西文化之沟通。他毕业于华中大学前身文华大学，并曾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伦敦大学，可以说是典型的洋博士。可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却也始终锲而不舍，并且以毕生精力营造贯通中西文化的桥梁。1915年他以英文撰写《孟子之政治思想》，取得文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可以看做是这一事业的发端。其后陆续发表的《佛教净土宗与基督教之比较》（1920）、《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1927）、《孔门伦理》（1929，博士论文）、《中国文化之精神》（1947）等论著，则是这一事业的继续与发展。50年代中期以后，韦卓民身处逆境，而于沟通中西文化致力更勤，如《康德哲学介绍》（1956）、《亚里士多德逻辑》（1957）、《培根及其新工具》（1956）、《康德哲学浅说》（1972）、《黑格尔〈小逻辑〉讲义》（成书年代不详）等论著，则着重介绍西方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且充分发挥了他在语言文字与学术素养两方面的绝对优势。早在1928年，韦卓民即已说过：“文化的改变并不一定危害到国家生命，反而经常使其更丰盛。其实这也是各种有机生命的基本原理。有机体须从其环境中吸收并同化一些要素，而只有在吸收及同化的过程不断的情形下，才可能有生命。”“综合一词是很重要的。它意指我们须对我们要综合的文化有完整的分析，比较其优缺点，然后造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保存两种文化的优点。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须以母体系统为新结构的间架。这是精神创新的工作……又是多么伟大的工作。”（《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韦卓民确实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这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理应抓紧整理与出版他那些未经公开

刊行的大批手稿，使之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韦卓民还是一个真诚的爱国的基督徒。他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认为“在基督那里，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无限宝藏”。但是，他又认为应该“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因此就需要“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基督教”，需要“尽量深入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多少世纪以来为中国文化所吸取的各种宗教、社会以及知识传统的精神，来看有没有和基督教生活观念能够配合的地方，在不抵触中国人观感的情况下，有没有若干因素可以利用作为表达媒介和作为接触的交点，用以将基督教义和制度传播与中国人民”。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他当然期望中国的基督教化，“将远东拥有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这个国家的优良文化，带到主的神坛前，作为对主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他又主张基督教应该中国化，即不仅应该产生本土化的教会，而且应该产生本色化的神学。基督教必须尊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形式”。而“在神之前，要有更多的庄严与尊重。公开崇拜，并不是殖民时代的乡镇会议”。（《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他同情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潮流，反对殖民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更反对宗教以不平等条约作为靠山。1927年元旦，他曾支持武汉基督徒联合会发表的《武汉基督徒革新运动宣言》（此件收于耶鲁神学院贝德士档案）。这个宣言公开声明：“耶稣基督以自由、平等、博爱、牺牲、服务立教，与罪恶的势力，绝对不能妥协，是一种革命的大势力。……我们深愿本着耶稣基督当年打倒法利赛主义，及传统的旧礼教，与当时之压迫平民的富裕贵族阶级，甚至舍身十字架之革命精神，以从事于我们的革命工作。”他们赞成反帝反军阀，对反基督教运动虽然难以苟同，但却称之为“诤友”，承

认基督教本身确实需要革新。他们赞同收回教育主权，主张“要使教会学校都归中国自办，受中国政府之监督，及其一切实施都依着中国的教育训令及学制而办之”。（引文出处同上）此后，韦卓民一直是中国基督教内部爱国与革新潮流的卓越代表。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率校西迁，与全国人民共同承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还向海外广泛宣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争取国际对我抗战的同情与支援。作为大学校长，他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认为“际此生死存亡之秋，中国人民的教育实系我们抵御外侮的文化前线”（《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他也曾自豪地宣称：“战争中的中国教育是一部史诗，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作为基督徒，他亦将自身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向海外介绍说：“在基督徒倡导之下，战后救济、医药服务、儿童福利等工作，已经显示出来，教会的爱心和善意是为全人类的，不管种族和国籍。……也显示出传教士在必要时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尽传教士职责；以及中国基督徒爱国，也决不后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中日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这样说，韦卓民先生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切努力，亦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

韦卓民与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期待着在抗战以后和平民主的新环境中，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加快提升华中大学的学术水准。早在 1938 年 6 月，他在美国《耶鲁评论》发表的《抗战初期中国的若干问题》一文，即已主张：“无论如何，在现在冲突以后，中国内部政治歧见，只能经由政治方法，而不能经由内战来解决。”但抗战胜利以后，内战接踵而至，蒋管区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

崩溃，使他在振兴华中大学与重建中国式教会两方面的宏图大愿都未能实现。1949年他未迁校台湾，亦未出走美国，而是与全校师生一起迎接了解放，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寄予新的期望，尽管在宗教信仰、政治见解和教育理念各方面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歧异。根据近年来我所查阅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在华外国传教士教育家们的私人信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教会大学基本上是倾向于寻求与中共、与人民政府合作的。他们有1927年前后因应国民革命（包括当时全国范围的反基督教运动）与国民政府的经验，认为只要遵守法令、适当妥协、自我调适，便不难逐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还能在新形势下谋求学校的迅速发展。可是，中美两国断交，朝鲜战争爆发，却导致教会大学从此绝迹于中国大陆。教会大学被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教会大学的校长自然更要充当历次政治运动中冲击的对象。在亚非各国教会大学中，中国教会大学办得最好，而其结局却最糟糕。这是中国教会大学的悲剧，也是韦卓民先生本人的悲剧，而对于这场悲剧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未形成深刻的共识。

当然，也不应该以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教会大学作为十多个颇具规模与水平的高层教育实体，毕竟在中国存在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它们不仅已经起过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而且它们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以及其他有关设施，至今仍然被新中国许多高等学校所利用。这些大学的校友，仍然在中国（包括海峡两岸）各地高等学校和其他部门为国家的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特别是在某些领域（如农业、医学等）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华中师范大学之所以率先纪念华中大学校庆，热心协助各地华中大学校友会开展活动，特别是此次为纪念华中大学

90周年校庆，在校园内树立韦卓民塑像，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并将正式出版韦卓民文集，都是为了表示对先行者劳绩的尊重，也是对作为教会大学之一的华中大学的应有肯定。

尊重教育，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分子，这是世界上所有经济文化发达国家早已行之有效的国策，并且多已蔚然成为社会风气。四十多年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失误太多，已经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迄至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也未能真正形成深刻的共识，特别是某些领导者仍然是停留于口头上的重视而缺乏应有的得力措施，所以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出版这本论文集，其意义不只限于肯定与纪念韦卓民个人的业绩，而且还想借此唤起人们更加重视教育与知识分子的真正觉悟。

1993年深秋  
于台北木栅学苑

# 目 录

“华大学人研究书系” 总序 .....	章开沅 (1)
序 .....	章开沅 (1)
韦卓民哲学遗著片谈 .....	王元化 (1)
功力绵厚 见地精深	
——韦卓民先生对康德“三大批判”的研究 .....	王宏维 (5)
读韦卓民先生西方哲学译著的文化断想 .....	邓晓芒 (34)
文化接受与交融的方法论问题	
——韦卓民文化方法论思想引论 .....	何建明 (46)
基督徒、学人、爱国者韦卓民先生 .....	[美] 鲁珍晞 (75)
韦卓民博士全球地域化理念考 .....	吴梓明 (79)
韦卓民的基督教人观	
——兼论其隐含对“神圣他者”和“他者”的思想 .....	陈广培 (102)
论韦卓民的基督教文化观 .....	马 敏 (123)
净土宗与禅宗	
——韦卓民、吴经熊宗教观比较 .....	李亚丹 (149)

韦卓民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论	周洪宇	(164)
韦卓民教育经济观及其时代照映	余子侠	(179)
一代人师 治学表率		
——韦卓民先生的做人与治学	曹方久	(203)
著名教育家：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教授	宋才发	(219)
深切怀念我的逻辑学老师		
——敬爱的韦卓民老校长	李华矩	(234)
韦卓民引领我们走向康德	唐有伯	(238)
编后记		(249)

## 韦卓民哲学遗著片谈

王元化

卓民先生逝世已有十多年了，他是我父亲的同窗好友。少年时父亲曾以卓民先生手不释卷的好学精神勉励我勤奋读书。他说，卓民先生每逢假期都订下阅读计划，读书之多令他敬佩。20世纪30年代初，卓民先生在武昌华中大学主校政，那时我刚进中学，适值长城抗战，局势日紧，北平谣诼纷传，一夕数惊，我们举家南下暂避，整整一个暑假就寄居在华中大学校舍中。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卓民先生，当时他曾利用余暇授我们几个孩子《大学》和《中庸》。暑假后，北方局势暂告缓和，我们全家回到北平，从此一别就是三十多年。60年代初期，卓民先生利用暑假来沪探亲访友，重新见面时我已进入中年。那时我对黑格尔兴趣正浓，提出要向他请教，他慨然应允，并约定通信讨论。他回武汉不久就按约定开始实行了。我们大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颇为频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断，并将那些信件全部销毁，直到1973年才又继续通信。这些信我保存下来了。几年前，我曾从中选出几封以《关于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通信》为题，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以表示我对卓民先生的悼念。

卓民先生素重康德，他曾向我谈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凌

驾于黑格尔之上，并要我攻读康德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近300万字的译著，其中有关康德的就占了绝大的比重。他译的康德著作，就国内来说，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质量上也堪列上乘。比如，《判断力批判》这部书的上卷原是由别人译述的，后来出版社改请他续译下卷，就是因为编者认为他更能胜任的缘故。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后又留英，在霍布豪斯门下就读，其时，他遍历欧洲几家著名大学深造，历时数年，得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英、法、德、俄诸语种，也精于拉丁文。这对他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极有裨益。他不是那种偏执一隅之解的学者，在学术上仅做一家的功臣，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拘囿在狭窄的范围内。他学贯中西，深知融合古今、触类旁通的重要。他生前曾向我说过，他留学英国时，打算钻研佛学，曾向一位年老的英国女专家请教。当他得知，欲通佛学，须懂巴利文，而学这门古文字又非三、五年不可时，才废然而止。尽管如此，他还是读了不少汉译梵典，并与我国佛学专家结交。我认识熊十力先生并向之请教，就是经卓民先生介绍的。卓民先生也精于黑格尔哲学，晚年撰《黑格尔小逻辑评注》，此书包括部分重译、注释、评论，约75万言。他逝世前估计至少已完成30余万字。他逝世后，翰伯正主持商务工作，我曾向他呼吁，收集遗稿出版，以嘉惠后学。可惜不久翰伯即染病瘫痪在床，陈原同志得知此事后向我函询，但因不知遗稿下落，事遂告寝。我为此一直深感遗憾，现在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了卓民先生遗著整理小组，筹划陆续出版先生遗著，上述《评注》也列入计划内，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我和卓民先生通信时，常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有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他指正。他的复信往往对所涉及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提出有益的指导，而且也